

双重冲击：后疫情时代 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困境*

佟韞成

【内容提要】 后疫情时代,中东欧 11 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引人关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升级构成了对宏观经济的双重冲击。为应对冲击,中东欧 11 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举措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因素在通货膨胀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认为,中东欧 11 国的通货膨胀发生机制具有特殊性,兼具供给冲击型和需求冲击型的特征,并且通货膨胀在演进过程中还受到域外经济体的政策外溢影响。这些特征使得常规的抗通货膨胀手段面临复杂的现实考验。尽管中东欧各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通货膨胀的影响远未消除,并且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 中东欧国家 动态 AD-AS 模型 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 佟韞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经济学将通货膨胀定义为“一个时期内价格水平的总体上升^②”。通货膨胀对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期通货膨胀不仅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③,而且相对价格的持续波动还会导致商品价格对市场决定

* 该文讨论所涉及的中东欧国家特指已取得欧盟成员国身份的中东欧 11 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② N. 格里高利·曼昆,卢远瞩译:《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1 页。

③ Robert J. Shiller, Why Do People Dislike Inflation? Monetary Economics eJournal, 1 April, 1996.

的均衡水平的偏离,扭曲资源配置状况,影响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①。这种由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最终会使经济体的总产出承受冲击^②。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欧盟 27 国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截至 2023 年 9 月,欧盟内部消费者物价指数为 4.3%^③,延续了 2022 年 11 月以来的下降趋势。但考虑到欧洲央行设定的 2023 年年度通货膨胀目标仍然保持在 2% 的水平,可以看出,欧盟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形势远未好转。通货膨胀问题在中东欧 11 国则尤为突出,2023 年 8 月中东欧 11 国核心通货膨胀平均值为 8.94%^④。其中,保加利亚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因素)^⑤为 9.48%,匈牙利为 15.21%。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给各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可以认为,中东欧已成为欧洲高通货膨胀最为明显的地区。这一地区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双重冲击下产生的。而中东欧各国为应对冲击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特殊作用。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区域通货膨胀的发生还可能受到其他区域经济活动和政策的影响,即具有外部性成因。因此,应当认为,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并且经历了动态的发展过程。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将采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究。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此轮通货膨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盟两个经济

① Milton Friedman, Nobel Lecture: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5, No. 3, 1977, pp. 451 - 472.

② G. Hess, K. Shin, Some Intra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 - Inflation Trade - Offs,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3, No. 2, 1999, pp. 187 - 203.

③ CEIC 数据库,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cn>

④ 由于缺少克罗地亚的相关数据,CEIC 中东欧经济活动追踪数据库公布的平均值并未考虑现有发布数据的中东欧国家实际为 10 个的情况,修正后排除克罗地亚的中东欧 10 国的平均值应为 9.84%。

⑤ CEIC 数据库,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cn/Central-and-Eastern-Europe-Economic-Activity-Tracker>

体,这些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借鉴价值。原因有二:第一,中东欧11国都是欧盟成员国,参与欧盟内部统一市场。其中,有6个国家^①加入了欧元区,其货币政策接受欧洲央行的规范和调控。中东欧11国的通货膨胀也与欧盟内部通货膨胀形势相联系。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升级对全球商品贸易和金融市场都造成了冲击,其中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发生以及美联储的应对措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因此,对这些研究的梳理可以更好地开拓分析这一问题的视野。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范围内普遍通货膨胀的成因方面,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疫情后总需求扩张、供应链中断及能源价格上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外部性因素四个角度展开。具体而言,余欣艺、许坤的研究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冲击,抑制了居民部门的消费。为抵消这一影响,疫情期间美国采取了“需求修复优先”的经济复苏策略,使得疫情结束后经济得到快速恢复。但居民部门消费的迅速扩张导致消费市场上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这就为疫情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创造了条件^③。鲍尔(Laurence M. Ball)等研究人员关注工资—物价机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认为,新冠疫情造成美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在此影响下,工资价格的上涨推高了核心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际供应链的波动使得原本由工资—物价螺旋机制推升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进一步偏离正常状态下的均衡水平^④。维尔道尔(Rafael Wildauer)等研究人员则从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收入分配模型(包含能源部门、商品产出部门、服务产出部门)证明在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下,国内市场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主要是借助物价—工资螺旋而非传统观点中的工资—物价螺旋机制发生的^⑤。这也提供了关于通货膨胀形势逐渐严峻的微观解释,即由于通货膨胀,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使得劳动力市场需求增加。但实际工资的下降抑制了劳动力

① 2023年1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欧元区。至此,中东欧地区共有6个欧元区成员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② 余永定:《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国际金融》2022年第10期。

③ 余欣艺、许坤:《当前美国通货膨胀成因、影响及未来走势的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7期。

④ Laurence M. Ball, Daniel Leigh & Prachi Mishra, *Understanding U. S. Inflation During the COVID Era*, NBER Working Paper, Oct. 2022.

⑤ Rafael Wildauer, et al., *Energy Price Shocks, Conflict Inf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 Three – sector Model*, *Energy Economics*, Vol. 127, Part B, 2023.

的供给,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工资的名义价格。提高的名义工资又使得居民部门的总需求增加,对供给端施加更大压力,加剧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另一些学者则研究了供给侧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迪亚斯(Elena Maria Diaz)等学者认为,能源及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中断导致了供给侧冲击,使得成本推动型商品(Cost - Push Commodity)的价格因素在推动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种通货膨胀的发生主要受供给方面的影响,可能会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从总需求的角度抑制通货膨胀)在应对疫情结束后的通货膨胀中效果不明显^①。类似的研究则证实了供应链中断问题对欧盟通货膨胀的主导作用:2021~2022年年初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自能源及供应链中断导致的供给冲击(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则由疫情期间其财政政策引起的国内需求扩张所支撑)。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升级进一步加大了经济体内部总供给的压力。与之相伴的是这一区域的经济逐渐走出疫情的影响,商业周期的恢复同样使得总需求开始增加,但与美国的情况相比,欧盟内部需求因素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虽然存在却远不及前后两次供给承压的影响^②。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已有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动态综合角度对欧元区的经济衰退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③,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实际影响提供了供给和需求分解的示例,这对于本文之后将要采用的方法具有借鉴意义。

货币政策也是分析通货膨胀成因和动力的一个重要视角:提高政策利率是央行通常采用的反通货膨胀工具,而名义利率又受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约束,央行无法对实际利率作出精确调控,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变动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的实际成效。勒穆瓦纳(Matthieu Lemoine)和林德(Jesper Lindé)对流动性陷阱条件下实际利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讨论:当政策制定者为稳定通货膨胀而选择提高政策利率时,由前一阶段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低实际利率水平并不会随之显著上升^④。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

① Elena Maria Diaz, Juncal Cunado & Fernando Perez de Gracia, *Commodity Price Shock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U. S. Inflation*,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Vol. 58, Part C, 2023.

② Christian Höyneck, Luca Rossi, *The Drivers of Market - base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in the Euro Area and in the US*, *Economics Letters*, Vol. 232, 2023.

③ R. Kollmann, *Effects of COVID - 19 on Euro Area GDP and Inflation; Demand VS Supply Disturbanc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Vol. 18, No. 3, 2021.

④ Matthieu Lemoine, Jesper Lindé, *Fiscal Stimulus in Liquidity Traps: Conventional or Unconventional Polic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51, Issue C, 2023.

策在此时很难发挥其应有的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在通货膨胀的外部性成因方面,波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则证实了欧元区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他们测算了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中东欧国家)经济受到欧洲央行和美联储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就中东欧市场中的价格而言,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冲击往往会导致名义汇率贬值和商品价格上涨,并且,中东欧经济体对欧洲央行政策的反应要比美联储的影响更为显著^①。这一结论表明,应当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对中东欧经济体的影响及后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

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聚焦于中东欧经济体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并且已有的关于欧洲经济问题的研究缺乏对通货膨胀历程的动态分析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供应链中断这一外部冲击因素的持续性影响^②。借助以上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本文将采取动态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对中东欧11国的通货膨胀发生机制展开探究,进而评估通货膨胀抑制政策的效果,最后对这一区域通货膨胀形势的可能前景进行探讨。

二 理论模型及含义说明

由于通货膨胀往往出现于具体的经济体之内,因此,可将研究范围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或者将其视作一个简化了的理想中的封闭经济体。这一假设也就意味着供给和需求的冲击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面将说明新凯恩斯学派的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原理^③及内涵,以便之后的应用。

(一) 通货膨胀、产出与外部冲击: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内涵

首先,为了进行动态分析,有必要引入时间变量 t 作为其他变量的下标,表示不同时期的对应变量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从产品和服务需求曲线出发,有:

$$Y_t = \bar{Y}_t - \alpha(r_t - \rho) + \varepsilon_t \quad (\text{式1})$$

式1表达式的含义是,经济体的总需求对应着每一期产品和服务的产

① M. Walerych, G. Wesolowski, Fed and ECB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s to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 70, 2021.

② Paolo Pasimeni, Supply or Demand, That Is the Question: Decomposing Euro Area Inflation, *Intereconomics*, Vol. 57, No. 6, 2022, pp. 384 - 393.

③ N. 格里高利·曼昆,卢远瞩译:《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1~349页。

出。而每一期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水平 Y_t 与当期经济的自然产出水平 \bar{Y}_t 正相关,与当期实际利率 r_t 负相关。这是因为,实际利率的上升会增加储蓄,抑制投资,进而使总产出减少。 $r_t - \rho$ 表示当期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 ρ 的差值,自然利率是在没有冲击时,令总需求等于自然产出水平时的实际利率。 ε_t 表示外部产生的需求冲击;当其为正数时,总需求扩张,反之则收缩。式 1 中的 α 是一个大于零的参数,实际上衡量的是总需求对实际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

关于产品和服务需求曲线中的实际利率,进一步有以下分解:

$$r_t = i_t - E_t \pi_{t+1} \quad (\text{式 2})$$

式 2 是一个费雪方程的变体,它表达的是实际利率 r 与名义利率 i 、预期通货膨胀水平 $E_t \pi_{t+1}$ 之间的关系(E 为通货膨胀预期, π 为实际通货膨胀率),即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正相关,与预期通货膨胀水平负相关。需要注意的是,对未来 $t+1$ 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在其上一期,即第 t 期形成的 E_t 。

接下来,引入与通货膨胀和产出水平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

$$\pi_t = E_{t-1} \pi_t + \phi(Y_t - \bar{Y}_t) + v_t \quad (\text{式 3})$$

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不同的是,式 3 里面包含了预期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一个外部的供给冲击 v_t ,这意味着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水平受到经济体以外事件冲击的影响而发生变动。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通货膨胀预期实际上形成于上一期 E_{t-1} ,与即期的通货膨胀率 π_t 正相关。并且,参数 ϕ 表示产出在其自然水平波动时通货膨胀的反应程度。该参数是正数,这保证了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达的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水平对自然产出水平的偏离($Y_t - \bar{Y}_t$)之间的正向关系。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当企业增加产出超过自然产出水平时,根据边际成本递增原理,产品的成本将会上涨,从而推动物价上涨。从现实的宏观经济角度看,企业扩大供给,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并不总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这就会引发工资价格上涨,继而增加产品成本,促成通货膨胀。

关于通货膨胀预期,这里采用适应性预期假设,即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与已观察到的实际通货膨胀水平相等,表达式为:

$$E_t \pi_{t+1} = \pi_t \quad (\text{式 4})$$

最后,在名义利率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关于货币政策与名义利率之间关系的方程:

$$i_t = \pi_t + \rho + \theta_\pi(\pi_t - \pi_t^*) + \theta_Y(Y_t - \bar{Y}_t) \quad (\text{式 5})$$

式 5 包含了之前几个方程中的变量:实际产出水平 Y_t 、自然产出水平

\bar{Y}_t 、自然利率 ρ 、实际通货膨胀率 π_t 、名义利率 i_t 。还增加了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 π_t^* 以及两个参数 θ_π 和 θ_Y ,这两个参数分别衡量央行对通货膨胀率的敏感程度和实际产出偏离目标产出的敏感程度,或者说,央行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容忍程度。当这种容忍程度越高时,参数的值就越小(两个参数均大于零)。这个方程提供了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名义利率的变化不仅与实际经济变量的变化有关,也受到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和决策判断的影响。

结合上述5个方程,可以分别得到动态总供给曲线方程:

$$\pi_t = \pi_{t-1} + \phi(Y - \bar{Y}_t) + v_t \quad (\text{式6})$$

以及动态总需求曲线方程:

$$Y_t = \bar{Y}_t - \frac{\alpha\theta_\pi}{1 + \alpha\theta_Y}(\pi_t - \pi_t^*) + \frac{1}{1 + \alpha\theta_Y} \cdot \varepsilon_t \quad (\text{式7})$$

可以发现,在两个描述动态过程的方程中,中间变量已经消去,只剩下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两个内生变量,其余变量均为给定值或代表外部冲击。至此,包含产出水平、通货膨胀以及外部冲击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方程已经建立。

(二) 通货膨胀发生机制——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

在正式对中东欧11国的通货膨胀成因展开论述之前,还需要对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两种不同的通货膨胀发生机制进行简要说明。

如图1所示,经济处于无冲击状态时,存在长期均衡下的自然产出水平,此时第0期的AD曲线与AS曲线相交于自然产出水平 \bar{Y} 上的点A,决定第0期的初始通货膨胀率 π_0 ,初始产出水平 Y_0 。当需求冲击在第1期发生时,总需求曲线向外移动(需求扩张),此时,总供给曲线保持在第0期,与新的总需求曲线相交于B点,并决定了第1期的产出水平 Y_1 和通货膨胀率 π_1 。与A点相比,新均衡点的产出增加,通货膨胀率提高。第3期,受到自然产出水平的影响,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以实现长期均衡。对应的经济含义即为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上涨,原有购买力所能购买的产品数量减少。最终,第2期的总供给曲线与第1期受到冲击而外移的总需求曲线相交于D点。D点位于自然产出水平线上,达到长期均衡。此时,第3期的通货膨胀水平 π_3 远高于初始通货膨胀水平,产出水平恢复至初始的 Y_0 。这一过程即为需求冲击型的通货膨胀发生机制。

而供给冲击型的通货膨胀则与总供给曲线受外部冲击影响而上移有关(见图2)。当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从 Y_0 减少至 Y_1 时,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与需求曲线的交点从点A移动至点B,其价格水平也会上升至 π_1 。但这与需求冲击型通货膨胀有所不同,供给冲击是供给端产生的问题。当通货膨

胀发生时,生产商品的原料价格和工人的名义工资都会随之上涨。更重要的是,来自外部的供应链冲击将直接对生产过程产生约束,最终直接影响市场上产品的供应。从对经济体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间来看,需求冲击产生影响的速率最快并且持续时间也更短;而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则更为长期,且难以通过常规的对总需求进行干预的货币手段予以解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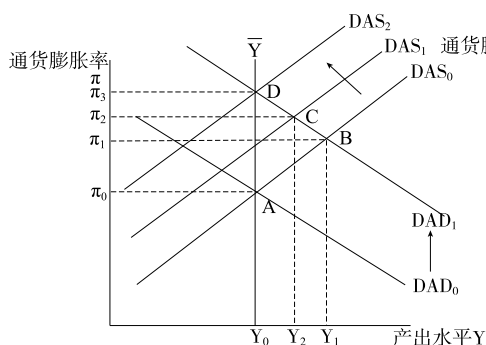


图 1 需求冲击型通货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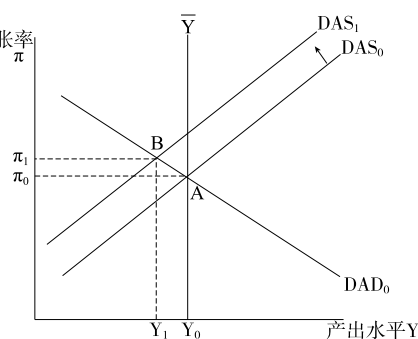


图 2 供给冲击型通货膨胀

三 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成因探析

要了解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的成因,首先需要对这一地区的通货膨胀历程进行分析。图 3 展示了 2020 年 1 月~2023 年 7 月中东欧 11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值的月度变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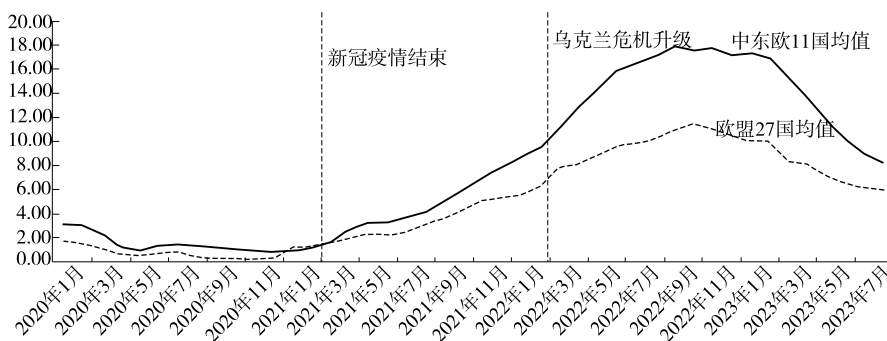


图 3 2020 年 1 月~2023 年 7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变化(%)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cn>

^① Olivier Jean Blanchard, Danny Quah,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9, No. 4, 1989.

图3反映三个特征:第一,202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一季度,即新冠疫情期间,中东欧11个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普遍下降,这一时期尚无明显的通货膨胀迹象;第二,2021年7月开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攀升,并且与欧盟整体变动趋势之间的差距拉大;第三,至2022年第三季度,中东欧11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峰值,此外,中东欧11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也明显高于欧盟整体水平。

从通货膨胀发展的时间历程上看,中东欧11国通货膨胀的背景主要有两个,即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升级。

(一) 通货膨胀发端:新冠疫情及经济修复

1. 新冠疫情对总需求的冲击

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居民的消费意愿下降,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总需求逐渐萎缩。此外,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东欧11国政府多数在早期实施了严格管控^①,这使得企业的生产也受到冲击,从而影响总供给(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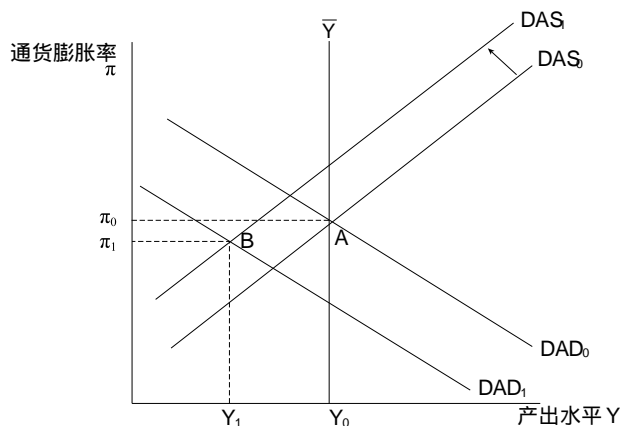


图4 新冠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

根据图4,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在冲击后形成了新的短期均衡点B,并决定了新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水平。相比疫情前,总产出水平明显下降。相应地,中东欧11国的GDP都在2020年发生了负增长。其中,克罗地亚的GDP降幅最大,为8.53%^②,成为中东欧11国中负增长最为明显的经济体。与疫

^① 鞠豪、苗婷婷:《疫情背景下的政府稳定性:以中东欧国家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CEIC数据库,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cn>

情前相比,新的通货膨胀水平相比初始位置则更低,这对应了图 3 中 2020 年第一季度至 2021 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到 2021 年第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升,经济进入疫情后的复苏阶段,疫情所导致的衰退期基本结束。可以认为,新冠疫情在中东欧经济体中产生负面冲击的时间开始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结束于 2021 年第二季度。

2. 新冠疫情期间中东欧 11 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与新冠疫情期间总需求受冲击而收缩形成对比的是,中东欧 11 国的政府支出明显上升,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和刺激性财政政策的需要。此外,中东欧 11 国政府债务占名义 GDP 的比重在 2020 年第一季度至 2021 年第二季度区间内的平均值大幅增加——由 2019 年的 42.68% 升至 50.29%^①。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 11 国政府普遍增加了公共卫生事业开支以及医疗物资进口,另一方面也与稳定总产出的财政政策有关^②。

不仅如此,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盟首次以融资主体身份发行共同债券,以筹集经济复苏所需的“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NGEU)^③。此次融资计划额度为 7 500 亿欧元,其中 3 900 亿欧元以赠款形式面向成员国发放,另有低息贷款 3 600 亿欧元向需要帮助的成员国开放^④。按计划,中东欧各国将获得赠款份额的 16% 以及低息贷款份额的 17%。中东欧 11 国中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兰和匈牙利是该项计划的净受益国^⑤。

在货币政策方面,这一时期,很多中东欧经济体采用了零利率政策(见图 5),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和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斯洛伐克 5 个欧元区国家^⑥。然而,央行设置的零利率实际上是对名义利率

① CEIC 数据库,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cn>

② Krzysztof Dębiec, Czech Republic: the Gradual Easing of Restrictions,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0-04-08/czech-republic-gradual-easing-restrictions>

③ The Common EU Response to COVID-19, https://european-union.europa.eu/priorities-and-actions/common-eu-response-covid-19_en

④ 杨成玉:《欧盟绿色复苏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国际贸易》2020 年第 9 期。

⑤ Konrad Popławski, Recovery Plan for the EU Economy: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React,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0-06-03/recovery-plan-eu-economy-central-european-countries-react>

⑥ 事实上,欧元区长期采取所谓负利率的非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央行将名义利率降为零,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收费以促进信贷投放。杜月:《欧洲负利率政策的背景、特征与影响》,《宏观经济管理》2021 年第 1 期。

的调整,即使不考虑零利率引发“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中东欧 11 国在疫情期间经济增长的表现也很难证明低利率与货币发行增加这一政策组合在刺激经济方面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的“纾困”作用(抵消居民部门收入的下降趋势、防止企业因资金链周转问题而经营困难)要超过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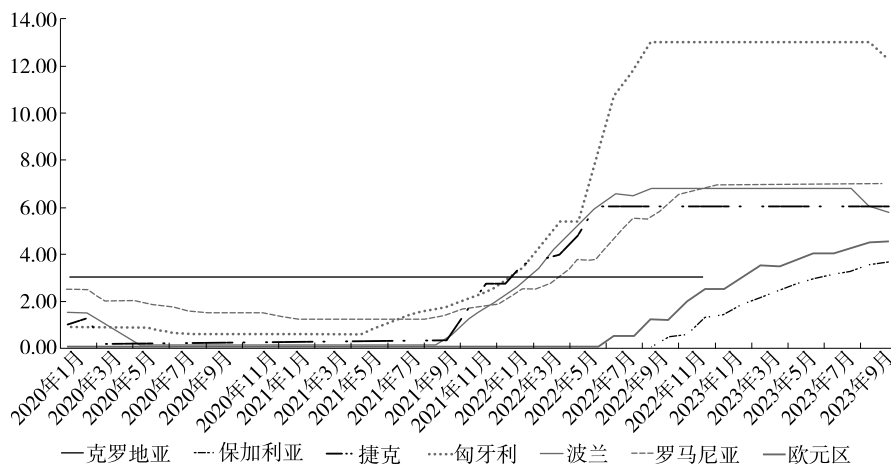


图 5 2020 年 1 月 ~ 2023 年 9 月中东欧国家和
欧元区政策利率变化 (%)

注:CEIC 数据库提供的各国政策利率分别为:保加利亚——名义基准利率、捷克共和国——贴现率、欧元区——主要融资再操作、匈牙利——基准利率、波兰——参考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罗马尼亚——回购利率、克罗地亚——贴现率。其中,克罗地亚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加入欧元区,此后政策利率与欧元区一致,故图中仅展示至 2022 年 12 月。

资料来源:同图 3。

在财政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重影响下,中东欧 11 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十分迅速。表 1 中 2020 年第二季度至 2021 年第一季度,11 个国家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疫情之前,达到或超过疫情前的 2~3 倍。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实际上是市场中交易媒介数量的增加,提高了经济体中的流动性和购买力水平。疫情期间居民部门消费的萎缩促使央行实施宽松性货币政策,进而提高了经济中的潜在消费需求。与此同时,税收政策调整和政府投资增加^①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封控措施对消费

^① Franciszek Tyszka, How Hungary Is Combatt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VID - 19,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0-04-22/how-hungary-combatting-economic-effects-covid-19>

能力和意愿的负面影响。

表 1 2019 ~ 2021 年中东欧 11 国狭义货币季度同比增速 (%)

时间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捷克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2019 年第二季度	9.91	13.06	4.18	2.49	7.19	11.51	5.59	14.01	8.48	7.48	6.15
2019 年第三季度	6.22	9.10	-3.22	2.56	-0.15	0.91	2.52	5.18	6.54	3.24	2.84
2019 年第四季度	13.44	11.01	3.84	5.38	6.23	3.25	9.14	13.14	12.93	9.29	6.52
2020 年第一季度	29.89	16.68	0.39	5.97	0.22	6.66	13.30	11.91	18.26	9.33	8.49
2020 年第二季度	34.24	17.19	5.78	15.05	3.43	11.71	22.36	25.33	17.24	11.98	13.35
2020 年第三季度	45.05	22.13	19.42	26.77	16.17	25.98	36.36	38.94	28.05	23.05	22.76
2020 年第四季度	48.60	28.37	22.99	37.51	21.79	30.56	41.78	34.29	31.17	23.82	27.18
2021 年第一季度	26.35	21.38	30.58	39.53	24.81	30.83	38.76	36.45	25.62	22.46	26.57
2021 年第二季度	24.75	22.56	25.95	32.05	26.06	25.98	30.19	22.82	28.02	19.13	21.63
2021 年第三季度	18.61	20.56	15.84	25.78	14.71	13.06	18.30	11.77	18.40	9.56	14.33
2021 年第四季度	7.52	9.49	2.80	14.13	5.10	3.17	10.83	4.38	9.42	2.64	5.63

资料来源:同图 3。

可以预料,新冠疫情期间受到冲击而萎缩的国内消费需求、政府为应对冲击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央行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都将对后续发生的通货膨胀产生直接的影响。

3. 后疫情时代经济修复与需求反弹

新冠疫情期间对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的收缩意味着,一旦疫情结束,经济进入复苏期,总需求会在短时间内经历迅速的扩张过程,而此时因供应链中断而滞后的供给则无法有效承接需求侧恢复所释放的大量购买力,因而而发生物价上涨。图 6 便是对这一时期总需求扩张引起通货膨胀的描述。可以看出,与疫情冲击时的 B 点相比,新的短期均衡点 C 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更

高,这也与图 3 中 2021 年 7 月~2022 年 2 月的变动趋势相吻合。

新冠疫情结束后,消费领域与供给领域的复苏不能保持相应的同步率。这也就意味着,央行所增发的大量货币实际上无法通过经济中增加的总产出有效吸收。这个因素在经济修复前期还只是体现在总需求方面的迅速恢复和扩张,当供应链中断产生的影响日益严重时,增发的货币也就转化为国内通货膨胀中价格水平上涨的支撑。此时,即使央行再次选择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的紧缩策略,也无法有效地应对通货膨胀率的快速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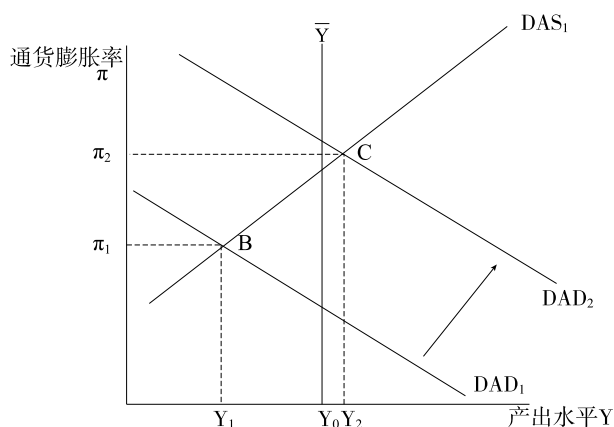


图 6 经济复苏期总需求的扩张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的供应链中断问题加剧和能源危机使中东欧经济再次遭遇冲击。双重冲击之下,中东欧 11 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在影响上相互叠加的总需求冲击与总供给冲击的混合发生机制。在其中,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的链接作用——使得新冠疫情的冲击效应持续至后疫情时代,并最终与供应冲击相混合。

(二)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通货膨胀的加速

在 2022 年 2 月 27 日发表的演讲中,德国总理朔尔茨将乌克兰危机升级称作“时代转折”^①。事实上,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延续和升级,也标志着欧洲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新的调整期。自此,对俄罗斯实

^① Sebastian Płóciennik, Germany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isation: Adjustment Strategies,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22-05-17/germany-and-crisis-globalisation-adjustment-strategies>

施制裁^①就成为欧盟及中东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由此引发供应链中断加剧、能源危机等问题,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图 7 表示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供给冲击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工业原料和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量减少),与疫情后复苏时期的总需求曲线相交形成新的均衡点 D。此时,相比前一期,经济的总产出减少,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一原理很好地解释了中东欧 11 国在 2022 年 3 月以来的通货膨胀变动趋势(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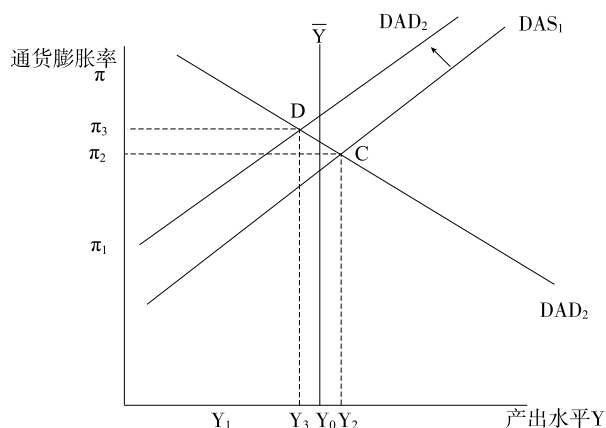


图 7 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的总供给冲击

1. 叠加影响下的供应链中断

供应链的概念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②,与前文讨论的新冠疫情对需求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内市场上的消费萎缩相对应,同样的冲击在供给侧则表现为供应链的中断。

图 8 展示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以 2016 年价格水平为 100 测算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工业材料^③价格指数变动趋势。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市场工业材料价格一路走高,考虑到疫情期间各国产品市场需求下降,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迅速上涨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供给能力的减弱,即供应链中断导致的制成品供给稀缺。这种稀缺同样具有传导效应,越靠近供应

^① 截至 2023 年 6 月 23 日,欧盟针对俄罗斯实施了 11 轮制裁措施,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response-ukraine-invasion/#sanctions>

^② 黄群慧:《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与应对:短期和长期视角》,《经济纵横》2020 年第 5 期。

^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注解,工业材料(Industrial Inputs)包含农业原材料(Agricultural Raw Materials)和基本金属(Base Metals)。

链下游,产品稀缺的影响就越显著。工业材料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疫情冲击逐渐消退的 2021 年上半年,工业材料的价格指数达到最高值,此后逐渐下降。这说明随着经济复苏而产生的强劲消费复苏拉动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供给端的复苏进度滞后于需求端复苏进度^①,因此,供应链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明显增大。到 2022 年 3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又使得原本趋于下降的价格再次上涨,虽然此后价格水平也呈现下降趋势,但截至 2023 年 6 月,工业材料的价格指数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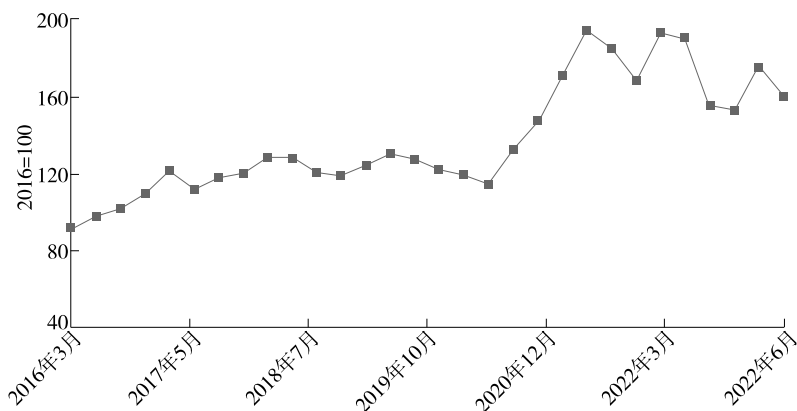


图 8 2016 年 3 月 ~ 2022 年 6 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工业材料价格指数季度变化 (以 2016 年价格水平为 100)

资料来源:同图 3。

总体而言,尽管乌克兰危机升级并非全球供应链中断的直接导火索,但前者的发生确实加剧了后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供应链中断问题在疫情结束后的确有了—定缓解,但乌克兰危机升级使得本就不稳固的修复基础—步遭受冲击,这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导致的生产分工格局调整以及对影响全球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预期造成的。无论如何,供应链的中断对任何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体而言都是不可忽视的风险来源和外部挑战。

2. 对俄能源依赖与能源供应危机

如果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是间接的,那么,这一事件对包括中东欧 11 国在内的欧洲市场和经济的冲击则是直接的,并且主

^① Jui - Chuan Della Chang, Dennis W. Jansen & Carolina Pagliacci, Inflation and Real GDP Growth in the U. S. - Demand or Supply Driven? *Economics Letters*, Vol. 231, 2023.

要表现为能源危机^①。

从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尽管 2022 年 9 月之后能源价格逐渐下降,但与疫情前相比,能源价格仍处于高位,这将给依赖能源进口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高昂的成本。

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虽然包括中东欧 11 国在内的欧盟各成员国就已经有意减少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和对俄能源依赖,但直至 2022 年 2 月,中东欧 11 国所消费的能源燃料中很大一部分仍依靠俄罗斯的供给。其中,只有克罗地亚自俄罗斯天然气进口为零,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国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度相对较低,其他中东欧国家自俄天然气进口占本国消费总量的比重都接近或超过 50%^②。根据一份关于中东欧国家能源政策的研究,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占 65%~97%)^③。因此,对俄罗斯能源的“脱钩”使得中东欧国家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承受着成本上涨的压力^④。

表 2 2021 年中东欧 11 国和欧盟整体能源进口依存度(%)

罗马尼亚	22.80
匈牙利	67.21
斯洛伐克	69.04
克罗地亚	74.48
波兰	83.57
捷克	92.13
保加利亚	96.24
斯洛文尼亚	99.44

① Impact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on the Markets: EU Response,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response-ukraine-invasion/impact-of-russia-s-invasion-of-ukraine-on-the-markets-eu-response/>

② IEA National Reliance on Russian Fossil Fuel Imports, <https://www.iea.org/reports/national-reliance-on-russian-fossil-fuel-imports>

③ Izabela Jonek - Kowalska, Multi - criteria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nergy Poli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A Long - term Perspective,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Vol. 44, 2022.

④ 韩萌、姜峰:《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欧洲研究》2023 年第 3 期。

(续表 2)

拉脱维亚	99.97
爱沙尼亚	100.00
立陶宛	100.82
欧盟整体	83.40

资料来源: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nrg_ind_id__custom_7991733/default/table?lang=en

能源进口依存度体现了一个国家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能源在其总能源需求中所占的份额^①,显示了经济体必须进口的能源比重。表 2 展示了中东欧 11 国与欧盟整体的能源进口依存度,不难发现,除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外,其他 7 个中东欧国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都高于欧盟整体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中东欧 11 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 2022 年 3 月之后与欧盟整体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见表 3)。中东欧 11 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同能源价格的上涨一起构成了其国内产品和服务成本在 2022 年 2 月之后迅速上升的条件。生产部门成本的上升经由供给影响到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从而为物价的持续上涨提供了动力;而服务业的工资也受到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不断抬升,提高了服务类商品的价格。此外,各国央行在前一时期所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为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支撑。

表 3 2022 年 1 月~2023 年 9 月按消费类别划分的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同比变化(%)

区域	中东欧 11 国均值				欧盟 27 国均值			
	食品	非能源工业品	能源	服务	食品	非能源工业品	能源	服务
2022 年 1 月	7.7	5.1	23.4	5.4	4.3	2.6	27.0	2.9
2022 年 2 月	9.2	5.7	23.0	5.9	5.0	3.5	28.7	3.1
2022 年 3 月	10.4	6.6	28.0	6.9	5.9	3.9	40.2	3.3
2022 年 4 月	12.4	7.2	32.7	8.3	7.4	4.3	35.6	4.0
2022 年 5 月	14.1	7.7	38.7	8.7	8.6	4.8	37.7	4.3
2022 年 6 月	15.8	8.2	43.8	9.6	9.9	5.0	41.1	4.3
2022 年 7 月	17.2	8.6	42.6	10.3	11.0	5.2	38.3	4.7
2022 年 8 月	18.5	9.1	42.9	10.5	12.0	5.9	37.5	4.7

^①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cache/metadata/en/nrg_ind_id_esmsip2.htm

(续表 3)

区域	中东欧 11 国均值				欧盟 27 国均值			
	食品	非能源工业品	能源	服务	食品	非能源工业品	能源	服务
2022 年 9 月	19.6	9.9	41.3	10.8	13.1	6.3	39.4	5.2
2022 年 10 月	21.7	10.2	32.6	11.2	14.7	6.9	38.7	5.3
2022 年 11 月	22.6	10.4	30.9	11.5	15.2	7.0	33.3	5.3
2022 年 12 月	22.7	10.6	25.3	12.0	15.3	7.3	25.5	5.5
2023 年 1 月	22.3	10.9	26.5	12.2	15.5	7.5	20.6	5.4
2023 年 2 月	21.9	10.8	24.3	12.2	16.6	7.5	16.6	5.8
2023 年 3 月	21.5	10.6	15.9	12.1	16.9	7.4	2.6	6.0
2023 年 4 月	18.7	10.1	11.6	11.7	14.7	7.0	4.4	6.1
2023 年 5 月	17.0	9.4	5.3	11.4	13.7	6.5	-0.3	5.9
2023 年 6 月	15.4	8.7	0.4	11.0	12.7	6.2	-4.1	6.2
2023 年 7 月	13.4	8.2	-0.9	10.6	11.6	5.7	-4.4	6.3
2023 年 8 月	11.3	7.8	0.1	10.2	10.2	5.4	-2.0	6.1
2023 年 9 月	9.5	6.8	-0.2	9.2	9.1	4.7	-3.6	5.4

资料来源: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prc_hicp_manr__custom_8023246/default/table?lang=en

在讨论了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发生的内生成因后,有必要再对这一地区通货膨胀问题的外部性因素进行探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下文中美联储的反通货膨胀举措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并不是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但从外部性角度分析通货膨胀发生的客观环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后疫情时代各国通货膨胀形势相互关联的特征,并提供理解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演变进程的更全面视角。

(三) 通货膨胀持续进程中的外部性影响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升级构成了对中东欧区域经济运行的双重冲击,在此背景下,基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变动形成的混合发生机制是中东欧 11 个经济体内生性通货膨胀的实际成因。然而,正如文献综述部分已表明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同样对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相当大的外溢效应^①。虽然这种外溢效应不能构成通货膨胀发生的充分条件,但从通货

^① M. Walerych, G. Wesolowski, Fed and ECB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s to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 70, 2021.

膨胀演进的实际过程来看,外部性因素仍然可能在特定时期内对一些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此期间的货币政策进行审视,以确定其在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演进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1. 欧洲央行的政策滞后

从图 9 可以看出,欧盟国家的通货膨胀进程与美国具有同期性,但其周期更长且峰值更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欧洲央行对通货膨胀形势的判断和反通货膨胀举措的滞后。与中东欧非欧元区国家的央行相比,欧洲央行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似乎更高,当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央行纷纷结束疫情时期的宽松利率政策时,欧洲央行仍然维持着长期以来一直实施的零利率(见图 5)。非欧元区与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将产生两个主要的影响:第一,为采取加息措施国家的消费市场提供充足的消费信贷,从而影响总需求的收缩速率;第二,欧元相对加息国本国货币贬值,加剧欧盟内部跨国贸易之间的价格波动。

2. 美联储反通货膨胀举措的影响

与欧洲央行相比,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开始时间更早(2022 年 3 月),并且在加息幅度方面更加激进。在持续的紧缩政策之下,美国通货膨胀先于欧盟出现放缓势头,并且避免了出现在部分欧盟国家中的经济衰退。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比,欧盟国家更加关注美国的反通货膨胀举措,特别是美国政府实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该法案意在对美国境内的绿色科技制造业提供补贴,从而控制物价、削减通货膨胀,但欧盟认为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以损害欧盟自身的绿色产业发展为代价^①。针对美国的反通货膨胀举措,欧盟一些成员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不满,并积极反对^②。但是,欧盟内部也存在不一样的声音。欧洲改革中心(CFER)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欧盟应当将重点放在降低能源价格上,而非加入毫无意义的“补贴竞赛”^③。就美联储

^① 《欧盟国家回击美〈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呼声日渐高涨》,《法治日报》2022 年 12 月 26 日。

^② Marie Krpata, Macron and Rutte Grow Closer to Each Other Through Geopolitical Shifts and a Personal Click, <https://www.ifri.org/en/espace-media/lifri-medias/macron-and-rutte-grow-closer-each-other-through-geopolitical-shifts-and>

^③ Elisabetta Cornago, John Springford, Energy Prices, Not US Subsidies, Are Europe's Biggest Headache, <https://www.cer.eu/in-the-press/energy-prices-not-us-subsidies-are-europes-biggest-headache>

货币政策对欧洲经济的影响而言,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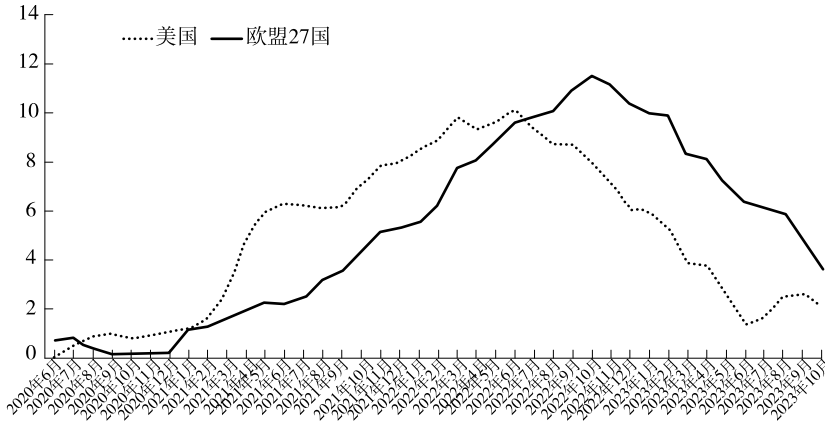


图9 2020年6月~2023年10月欧盟和美国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度变化(%)

资料来源: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PRC_HICP_MANR__custom_7774427/default/table?lang=en

事实上,美联储经过历次加息已经使得包括欧元在内的欧盟国家货币对美元多次贬值,而美元又是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的计价和结算货币,这使得欧盟国家国内市场上的进口货物价格不断上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对俄天然气供应的替代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天然气进口。汇率市场的这一变化无疑为能源价格提供了充分的上涨动力,进而加剧欧盟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此外,汇率的变化也会影响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生产成本的传导性变动,进而对中东欧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除能源外的其他商品产生涨价的驱动力。

(四) 通货膨胀的结果:潜在产出水平的下降

对动态总供给和动态总需求曲线方程的推导,需要经济处于无外部冲击的正常状态,此时,经济实现长期均衡。对于长期均衡,可以描述为以下条件:

$$\begin{aligned}
 Y_t &= \bar{Y} \\
 r_t &= \rho \\
 \pi_t &= \pi_t^* \\
 E_t \pi_{t+1} &= \pi_t^* \\
 i_t &= \rho + \pi_t^*
 \end{aligned}$$

长期均衡时,经济的总产出水平与自然产出水平相一致,或者说,经济实现了潜在产出水平。自然产出水平受到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模型之外的因素决定^①。显然,模型中虽不包含这三方面的变量,但模型所对应的现实经济意义不可能不对这三个方面产生影响。以资本积累为例,前文已经提到,实际利率对投资有抑制作用,对储蓄有促进作用。一般来说,资本存量的变动是投资与折旧之间的差值,投资的减少往往意味着资本存量的下降。资本存量的下降势必会对经济体的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此时,长期均衡状态下的自然产出水平也会随之减少。因此,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变化实际上会对模型之外的因素产生影响,反过来影响模型中的参数。

由图5可知,不论是否为欧元区成员,中东欧11国在通货膨胀发生后都面临相同的名义利率上升政策处境。这一反通货膨胀举措实际上是基于高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抑制作用,从而减少市场对产品、服务和流动性的需求,最终实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从这一举措的原理上看,对投资需求的抑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资本积累的总量,进而影响均衡状态下的自然产出水平。图10反映了在通货膨胀影响下自然产出水平的改变。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相交于新的自然产出水平线上,形成了新的均衡点E。与通货膨胀时期(第3期)的短期均衡点D相比,新的均衡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低,但新的自然产出水平下降说明经济体的潜在产出水平也在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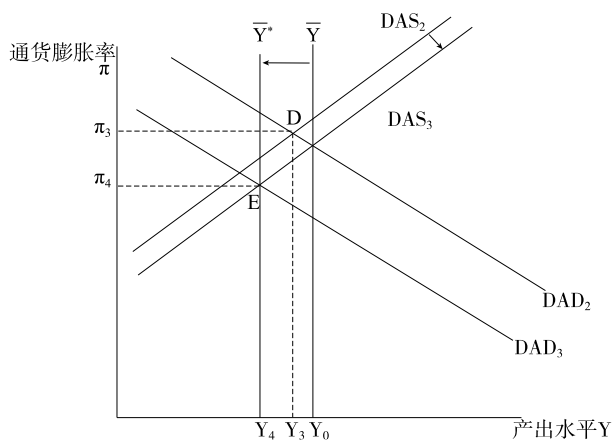


图10 自然产出水平改变

^① N. 格里高利·曼昆,卢远瞩译:《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2页。

结论与展望

新冠疫情对中东欧 11 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在特殊的外部冲击作用下,各国政府通过自身政策调整、欧盟内部合作机制等对经济进行了短期调控。然而,这些临时性的措施却对这一地区通货膨胀的发生产生了持续性影响。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总需求的快速恢复与供应链紧张之间的矛盾是通货膨胀发生的直接原因。此后,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加剧和能源价格剧烈上涨使得中东欧 11 国的通货膨胀率迅速攀升。本文认为,中东欧 11 国前后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变化可以借助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得到解释:供给冲击型与需求冲击型相混合的发生机制构成了中东欧 11 国自 2020 年开始的通货膨胀的内在动力。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则对中东欧 11 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产生外溢影响,使得这一区域的通货膨胀周期延长、反通货膨胀的难度增大。

本文还分析了通货膨胀对中东欧经济体发展潜力的损害。提高政策利率的反通货膨胀举措会影响经济体的资本积累,从而拖累经济潜在产出水平的增长。不仅如此,能源价格的上涨消耗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和储蓄,并且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不平等^①。而政府则在前一时期承担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和税收减免,对居民部门的持续补贴也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这将在远期限限制财政政策的能力和效果^②。

通货膨胀问题还会对中东欧经济体的第二次转型^③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次转型是在现有的欧盟内部合作框架内发展数字产业和绿色产业,从而提振经济运行效率、降低能耗、增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④。然而,前文已经提到,中东欧 11 国的财政能力已经因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的“纾困”举措而削弱,

^① Lilia Karpinska, Sławomir Smiech, Multiple Faces of Poverty. Exploring Housing – costs – induced Energy Pover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Vol. 105, 2023.

^② Elisabetta Cornago, John Springford, Europe Needs Both Fiscal and Energy Solidarity,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23/europe-needs-both-fiscal-and-energy-solidarity>

^③ 孔田平:《增长、趋同与中东欧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欧亚经济》2022 年第 2 期。

^④ 姜珺、张海燕:《欧盟绿色和数字化转型与捷克第二次经济转型构想》,《欧亚经济》2022 年第 2 期。

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培育又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税收减免。此外,私人投资部门资本的缺乏^①也成为这些国家继续产业转型的限制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欧经济体的第二次转型仍需要来自欧盟和其他发达成员国的援助和扶持。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就呼吁,欧盟应采取相应的补贴和救助措施以应对中国和美国对欧盟内部对应产业,特别是中东欧 11 国的新兴产业构成的竞争和冲击^②。

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会给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后疫情时代欧洲一体化有了新的进展,“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就是一个例子。在此背景下,中东欧 11 国更加注重与欧盟整体政治立场的一致性,对供应链安全的关切使得欧盟国家开始对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产生担忧,欧盟的政策举措和对华立场也将不可避免地中东欧 11 国以及未来可能获得欧盟正式成员国资格的其他中东欧国家产生影响^③。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欧盟的这种对华疑虑仍将持续很长时间,并将构成对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潜在挑战。

但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双重冲击也严重削弱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韧性,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东欧 11 国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对来自外部的投资需求势必会有明显的增长。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对于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的担忧也同样会使一部分中东欧国家倾向于寻求对外经济合作的多元化,这就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提供了良好的深化发展的契机。对此,中国应当主动把握时代机遇,针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合作形式。在支持欧盟内部合作机制的同时积极运用欧盟法和国际法维护自身正当的利益诉求。通过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增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互信、求同存异^④,巩固和扩大双方合作的共识基础,更好地利用各自的优势产业和资源禀赋,推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在新形势下创造更多更新的实践成果。

(责任编辑:李丹琳)

①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和资本主义类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Konrad Popławski, Can the Global Battle for Electromobility Pose a Threat to Central Europe?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23-03-30/can-global-battle-electromobility-pose-a-threat-to-central>

③ 王弘毅:《地缘政治变动下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趋向论析》,《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5期。

④ 韩萌:《新形势下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的政策选择》,《欧亚经济》2020年第6期。